

从模仿到自主:中原地区大型企业创新行为的文化渊源与演进方向

伦 蕊

(河南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3)

摘 要:认为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个人和团队的行为模式,中原传统文化中的重道轻器、中庸保守、敬重权威、族群主义、循序渐进的时空观以及兼容并蓄等基本特质是该地区大型企业模仿创新行为的文化渊源。以演化思想为依据尝试解释情境变迁过程中创新文化升华及创新行为演进的动态特征。

关键词:创新行为;文化渊源;演进方向

中图分类号:F1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8)09-0031-05

0 引言

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演进,创新逐渐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并成为各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White, L.A.)曾提出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命题:“行为是文化的函数”^[1]。创新作为一种主体行为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哲学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企业的创新行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 of Science 简称 CSS)就是一种试图打破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之传统边界,并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趋势。在这种研究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了创新文化的相关研究,如Tushman & O'Reilly(1998^[2])对3M、Intel等公司的研究验证了组织内促进创新的文化因素导致了新思想的诞生、新方法的产生,以及公司内的持续创新。萨克森宁(1999^[3])则以硅谷和128公路地区为例研究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不同的经济表现和创新结果。他认为创新文化可能引发多种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们能够唤起涉及到公司效率和职能发展进步方面的观点和变化,并促使这些观点和变化得到接受和支持。李钟文等人(2002^[4])对硅谷成功经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有无创新文化”的理论研究如火如荼。李约瑟(Joseph Needham)最早于1969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指出:“为什么中国早期的科学技术较

西方更为发达,但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李约瑟从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科学技术的地位开始,得出了“中国思想风格中固有的内部因素阻碍了哲学层次上的理性主义演绎和因果解释方式的抽象化发展”的结论^[5]。“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虽是一个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全面解决的问题,但对它的研究带动了众多学者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分析与反思。刘钝(2000^[6])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文化,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因而也就较少像西方那样对科学顶礼膜拜。阮爱莺(2001^[7])认为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强调整体统一、偏重直觉体验、崇尚中庸调和、侧重内倾意向为主要特点的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封闭保守、漠视个性、忽视理性等诸多弱点,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高炜等人(2002^[8])指出,中国创新精神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严重制约。其中,崇尚、追求安稳的文化心态,形成抑制创造力生长的社会心理基础;尊崇某些权威的社会伦理,成为阻碍个体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形成与发展的行为规范;重伦理道德、轻科学精神的社会风尚,影响科学精神的确立。

现有研究大多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一致性为其假设前提,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征,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的气质不同、风格各异。本文认为,只有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于特定区域,才能使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具有实际意义。在北宋南迁以前,中原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正统,在中国文明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中原地区的文化创造和历史传承无疑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城邑、文字、青铜器等中国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最早出现于中

原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成为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重要标志(范毓周,2006^[9])。中原文化并非单纯的地域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合流的产物,儒、释、道、法是构成中原文化最基本的成分,但是,由于长期以中原地区为统治中心的封建统治者奉行儒学独尊的政策,儒家思想观念逐渐积淀成为生活在中原地区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王保国,2006^[10])。有鉴于此,本文选取渊源久远、承继传统儒家文化精髓的中原文化为研究对象。

古代河南属豫州,又称中州,“中州”一词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中原文化这种心理定势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行为方式在该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传播、渗透和积淀,逐渐孕育形成了当地企业独具特色的创新行为与文化。2003年,河南大型企业 R&D 支出额、研发人数、新产品产值和申请专利数 4 项指标分别占到全省工业总体的 75.4%、65.0%、73.7%和 67.8%,可见,无论从研发投入还是研发成果的比重来看,大型企业都是区域创新的行为主体,因此本文选择河南大型企业为选样窗口。特别指出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从 2005 年河南 100 家重点大型企业中随机抽取的 27 家所做的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对本研究基本思路的形成提供了灵感与启发,这些企业的基本经济指标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行业构成(%)	经济类型构成(%)	基本经济指标平均值				
		调查样本	全省工业			
采矿	11.1	国有独资	22.2	单个企业产值(亿元)	16.4	0.6
制造	81.5	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51.9	总资产利税率(%)	8.8	8.5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及供应业	7.4	股份有限公司	22.2	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7.2	5.5
		中外合资企业	3.7	增加值率(%)	37.1	33.2

相对于前期研究来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前期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基础性,但在对企业创新行为展开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以传统文化多样性为基本出发点的相关文献还不多见,而本研究有助于厘清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二是以演化经济理论为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文化的演进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还未出现,本文尝试解释情境变迁过程中创新文化升华及创新行为演进的动态特征。

1 行为模式中文化因素的核心性与动态演进性

文化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1 行为模式中文化因素的核心性

文化是一个既定人群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关于思维、行动和感受的理所当然的假想模式(Hall,1959^[11])。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1988^[12])指出文化的 3 个特点:铭刻在人们的内心;缓慢诞生,但每天都获得新生力量并取代权威力量;能够维持人们的法律意识。可见,文化对民族、对组

织、团队和个人成长的影响力与作用力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或削弱。

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个人和团队的行为,它根植于生活,又在每一环节上规定和制约人类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感知,使我们的思维、言语和行为在不知不觉中遵循着我们所从属的文化的特定要求。具体来说,文化因素从规范行为方式和个体行为方式两个层面影响个体行为,前者指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行为有较强的规范作用;后者指个体的兴趣、爱好与行为受文化的影响。

对于企业来说,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和最核心的。套用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如果把硬实力当作常数,那么软实力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体现于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开放思维等多个方面的企业创新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13]。

创新文化通过激励机制激发行为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风险的承受能力;它能够形成一种渗透机制,影响企业家决策及其管理实践,并促进企业组织制度的演进;它通过导向机制,形成协同创新氛围,推进深层学习循环,达

到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终极目标。在这样的组织里,员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形成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不断响应挑战,持续创造和传递知识。

1.2 行为模式中文化因素的动态演进性

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它可以吸收与兼容外来文化,但这种过程并不改变其文化的主体特征,而是以我为主,接纳和改造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这种文化交流和选择的结果是文化位势的提升,即从低位势文化向高位势文化的演进(胡军,1995^[14])。企业文化与作为其文化环境的民族文化之间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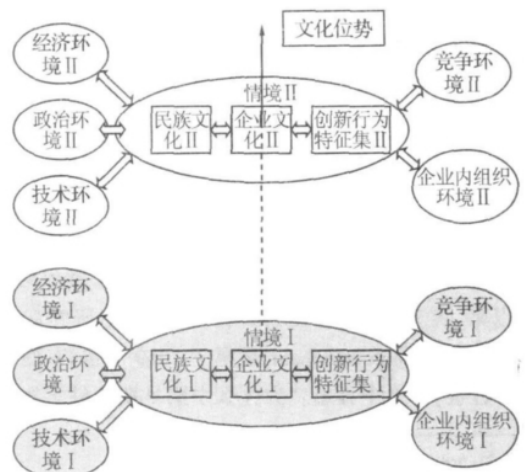


图 1 情境变迁与企业创新文化的演进

在着一种协同创新和交互演进的关系。伴随着民族文化位势的提升,企业创新文化及相应的一系列创新行为特征也将演进发展、与时俱进。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竞争环境,甚至于企业内组织环境等的演变,都有可能成为诱发民族文化位势提升的情境因素。

2 中原地区大型企业的模仿创新行为及其文化溯源

从深度访谈的情况来看,模仿创新仍是中原地区大型企业创新行为的主流模式,多数企业在技术基础和禀赋条件的制约下,将创新定位于寻求现有市场空隙而非创造市场的快速模仿阶段,企业普遍不掌握行业核心技术或关键零部件技术,而是沿循一种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吸取率先者的成功经验、引进购买或反求破译率先者的核心技术秘密,从而实现对产品的功能、生产工艺的发展与改进等一系列活动。调研中取得的样本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等相关指标为上述判断提供了量化依据。从表2可知,样本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在研发投入力度和研发绩效方面的表现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可以认为它们尚未进入创新活动相对活跃的自主创新阶段。

表2 样本企业研发活动基本指标

	样本企业构成(%)				样本企业均值	世界500强企业参考值 ^[15]
	>5%	5%≥X>3%	3%≥X>1%	≤1%		
R&D支出/销售收入	3.7	7.4	14.8	74.1	1.0%	10%≥X>5%
R&D人员/从业人员	3.7	11.1	18.5	66.7	4.8%	10%以上
新产品产值/总产值	11.1	14.8	33.3	40.7	10.2%	30%以上
拥有发明专利数/从业人员	3.7	3.7	25.9	66.7	5.2件/万人	50件/万人以上

“行为是文化的函数”,本文着重从以下6方面分析企业模仿创新行为的文化渊源。

2.1 重道轻器与模仿创新

从本质上讲,具有深厚儒学思想积淀的传统中原文化属于人文文化,相对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这是导致现代企业以模仿为主流创新模式的文化渊源之一。《论语》中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反映出一种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的守旧思想;同出于《论语》的“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将科学技术视为“小道”,甚至将伦理道德与科学技术对峙起来;韩愈也曾曾在《师说》中不经意地流露出同样的看法:“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这里隐含着当时主流社会对从事技术、技艺类职业之人的轻蔑;明代士大夫的“道上器下”、“奇技淫巧”,更是反映了他们过分追求一种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排斥分析的所谓精神境界。

儒学的知识论是“格物致知”,就其获得知识的直接实

践来说,很大程度上局限于道德践履的范围之内;就其获得知识的手段来说,主要是强调间接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的学习。由于“道”并非强加于人的外在绝对精神或理念,而是源于实际的伦常关系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理论概括,“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道德内省,变成了对“良知”、“本心”的体认,这与探究物理、认识自然并建立一套改造、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手段的知识发展方向相去甚远(郑晔,杨世文,2003^[16])。

2.2 中庸保守与模仿创新

创新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或风险性的显著特征,而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反对冒险,是造成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论语》的“中庸,天下之正理”,朱熹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李泽厚先生也认为“中国人具有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气质,不狂暴,不玄想……反对冒险,轻视创新……”^[17]。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谤之”更是反映了社会对革故鼎新行为的普遍抵制。中庸之道固然有其反对激进、不走极端、追求和谐的正面效应,但它以“中和”为准则,主张“知足常乐”、“安分守己”、“不为人先”等维持现状、否定变化的思想却给企业创新动机带来负面影响。在中庸之道的文化心理作用下,企业更倾向于风险小、投资周期短的技术引进和再创新方式,偏重于创新的后阶段,即商业化阶段和扩散阶段,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而非以发明专利为主,这种战略选择动机具有显著的被动性、短期性和生存适应性。

在中庸之道的文化心理作用下,企业更倾向于风险小、投资周期短的技术引进和再创新方式,偏重于创新的后阶段,即商业化阶段和扩散阶段,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而非以发明专利为主,这种战略选择动机具有显著的被动性、短期性和生存适应性。

2.3 敬重权威与模仿创新

传统儒学重礼教、强调等级隶属关系,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强调社会的等级秩序以及论证这种秩序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孔子要求“畏大人”,进而主张建立“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体系,正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提出“后儒家假说”的kahn(1979)认为,儒家文化中人们的阶层感和权威取向对东亚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具有重要影响。纲常儒学对企业中家长式的领导风格、家族式的组织结构和权威式的企业文化起到牵引和导向作用。敬重权威的文化心理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各种既定的制度规范,服从上级和尊长,这压抑了普通员工的创新欲望。层级型组织内的创新决策由具有企业家注意力的高层决策者承担,其它所有操作性活动分布于各个层级,并根据当事人的能力高低分别由不同人承担。高层决策者通过层级制传递其决定性信息,忽略各职能部门的局部内隐知识。相对于全员创新来说,这种精英创新模式将创新行为局限于企业内的少数专业化技术人员,知识在组织内的共享与整合不活跃,企业难以借助协同效应推进自主创新战略。

2.4 族群主义与模仿创新

传统儒学强调一种“族群主义”的人生定位,强调“能

群”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在这样的群体原则中，甚至贵为天子诸侯的个人，也应该“群而忘己”。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等级家族社会，在这一体制中，“群体本位”的真实涵义就是“家族本位”。个人的感情、爱憎不会超出家族、亲戚的范围，单个家族集团有了凝聚力，而整个社会却是散沙一盘。宗法家族社会是小的、封闭的、不开化的和同质性的社会，家族的意识、生活方式和文化都驱使家族成员为追求或维护家族的利益而置社会利益于不顾，即对同宗族的认同凝聚和对异宗族的抗拒排斥，这造成小群体的家族和大群体的社会之间的矛盾。

儒家文化的家族取向使得企业家在建立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时，首先会考虑到直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因为这种组织结构与家族十分类似，直线中的层级相当于家族中的代际关系。相应地，企业的研发任务被划分为多个子系统并下达各个开发小组，各开发小组则按照任务要求独立地推进研发活动。由于纵向控制的能力过度发达，抑制了朝“横向联系”方向发展的能力。显然，在部门集体主义导致的这种线形创新模式下，各种投资的创新工程和项目只会强化孤立的点、线的能量，而不可能发展出释放这些能量的网状系统来，这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的绩效预期，提高了自主创新的失败风险。

2.5 循序渐进与模仿创新

传统中原文化认同循序渐进的时空观，如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祸福之来，皆起于渐”等都认为事物的变化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所谓“积微而见著”。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技术进步严格遵循起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渐进式创新路径，这是企业基于原有的技术轨迹和组织惯例，在既定技术资产(资源和能力)和产品范畴的基础上，通过渐进性的产品和工艺创新维持、强化现有能力的一种路径选择方式。这种创新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容易固化企业的能力体系，不存在向其它具有不同知识基础的新路径跃迁的可能性，不利于企业推行自主创新这种技术跨越幅度相对较大的创新战略。

2.6 兼容并蓄与模仿创新

中原地处华中，人口的频繁流动和民族融合带来价值观念的交融碰撞，善接纳、开放性的文化特质造就了中原人的开阔视野和灵活头脑，不僵化、不保守，形成多元文化生态。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容文化气质同样对企业借鉴模仿的创新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3 情境变迁与中原地区大型企业创新行为的演进方向

现存的企业创新行为特征不是任何决策者的主观设计，而是社会文化自然选择的结果，有着深厚的非正式制度背景，而其进一步的成长完善也依赖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情境变迁。本文认为，推动中原地区企业模仿创新

行为演进发展的主要情境因素包括以下6点。

3.1 工业精神的培育打破“重道轻器”的传统思维

胡军等人(2003^[9])指出，要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在发扬“商业精神”的同时，有效培育“工业精神”这种创新型文化。“工业精神”强调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具有重视理性、重视实业、重视科学、重视创新等基本特质。“工业精神”是一种极具凝聚力、感召力和创造力的新文化，通过把传统的重商精神、流通致富意识升华为一种工业精神与实业精神，逐步形成全社会尊重实业、尊重科学、尊重技术、尊重法治的精神，并将其升华为经济行为的动机，使工业精神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取向和共同价值观念，将对企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3.2 模仿行为的风险——收益函数变化导出中庸之道的新选择

失败率较低是模仿创新的优势之一。模仿创新是对率先创新的创新成果进行产品性能、工艺改进，或进行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开拓，所以失败率相对较低。但企业成长过程中自身禀赋条件的持续提升将有效改善企业瞄准行业最前沿技术实施自主创新所需的支撑条件，增强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

与此同时，反向工程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风险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壁垒正在显著改变模仿创新行为的风险函数。目前，在IT、无线通信、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领域，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明专利权占有率高达8成以上，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国外企业进一步开拓中国国内市场受阻，或者本土企业迅速成长进而分食其原有市场份额，它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举起知识产权大棒。目前DVD、彩电、手机、电池等传统制造行业均已出现上述迹象。情境变迁改变着模仿行为的风险函数，在规避风险、保守求稳的中庸之道的文化心理作用下，自主创新将可能成为企业创新模式的首选。

3.3 人本管理促成勇于挑战权威的全员创新氛围

近年来，以“授权与释能”为鲜明特征的人本管理模式逐渐流行，人本管理是指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围绕着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其主要内容有：运用行为科学重新塑造人际关系；促进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实行民主管理，提高员工参与意识；培育企业精神等。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更注重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发挥，更关心人的内在需要，更注意开发人的内在潜能，更具人性化和个性化的管理特征。它对人的激励不是一种外在推动，而是一种内在引导，是通过企业文化的塑造，在员工心目中树立起创新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对于企业创新发展的强烈使命感和持久驱动力。其中，建立适合创新的复合型激励模式、提升知识技术型员工期望的多样性、创新实施过程中的充分授权、公开自由的沟通渠道和信息共享、把官僚主义作风降到最低程度等具体措施都有助于加速组织内全员创新氛围的形成，

提升包括执行能力、评估激励能力、建议处理能力、联结能力和学习能力等在内的一系列全员创新流程能力。

3.4 企业组织架构革新形成回馈交融的网状创新路径

传统的企业组织架构是一种“自上而下”、“单线链条式”、“等级森严”的管理模式,相应地,其线形创新模式由于缺乏反馈渠道而效率低下(kline & Rosenberg, 1986^[20])。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上下级之间“带宽过窄”的“单线链条式”信息流通渠道常导致贻误商机。因此,扁平化组织结构应运而生,它就是通过破除企业自上而下垂直高耸的结构、减少管理层级、压缩职能机构、扩大管理跨度来建立一种紧缩的横向的网络组织,达到使组织更灵活、敏捷、富有弹性和创造性的目的。

在这种以 IT 应用为工作平台,以企业内部各功能单元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跨边界资源整合为基础,由活性节点网络连接构成的网络创新模式(SIN)中,发生了创新范式的转变,不同职能部门在创新活动中从各自的角度同时参与知识与信息的生产,信息传输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的和迅捷的,在逐渐演绎出一套关于部门间共享、信任、文化和承诺的详细关系规范后,这种创新网络适应了信息社会的高效率、快节奏,实现了企业内部上下左右的有效沟通,大大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的效率和成功机率。斯顿麦兹(Charles Proteus Steinmetz)创立的美国“无墙实验室”(lab without walls)的成功就是其典型例证。

3.5 技术集成机遇引发跨越式创新新思路

渐进式创新一般要经历一个包括起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 S 型曲线发展周期,其发展过程相对缓慢,而跨越式技术进步则是一种技术质变和技术飞跃,它突破原有技术,以同一曲线上的节点跨越甚至不同曲线间的跃迁方式建立新的技术基础。跨越式创新路径与企业现有技术基础要求颇高的自主创新联系紧密,对受禀赋条件制约的一般企业来说常常可望而不可及。但所幸的是,近年来逐渐流行的技术集成为跨越式创新路径提供了重要机遇,对企业的自主创新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技术集成创新是一种注重技术扩散、融合及在产业部门广泛运用的技术结合创新(Iansiti, 1998^[21]),它更注重在原有不同产品基础上有机结合,进而融为一体的产品重新塑造。在这种情况下,每种制造技术的效能可能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融合后产品的整体功能和附加价值却实现了提升,如深圳朗科基于 USB 和 Flash 芯片技术开创的闪存盘市场,就是企业利用技术集成机遇获得的创新成功。

3.6 核心技术封锁阻断模仿借鉴之路

作为当前主要技术源的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封锁阻断了企业的模仿借鉴之路。目前,从国外引进前沿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以及拥有前沿技术的跨国公司从保持自身竞争力的需要出发,都在对转移或转让技术持更加谨慎甚至封锁的态度。这一变化在推动企业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路径

演进过程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关键作用。

4 结语

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个人和团队的行为,我们的思维和活动都在不知不觉中遵循着我们所从属的文化的特定要求。不同的文化背景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中原传统文化中的重道轻器、中庸保守、敬重权威、族群主义、循序渐进的时空观以及兼容并蓄等文化特质是该地区大型企业模仿创新行为的文化渊源。

行为模式中的文化因素具有动态演进性,现存的企业创新行为特征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函数,其进一步的成长完善也依赖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情境变迁。本文认为,推动中原地区企业模仿创新行为向自主创新行为演进的主要情境因素包括:工业精神的培育、模仿行为的风险——收益函数变化、人本管理和组织结构扁平化等新理念在企业中的广泛实践、技术集成机遇,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封锁。

参考文献:

- [1] [美]L.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 [2] TUSHMAN, M.L. & O'REILLY, C.A. III. 创新制胜[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 [3] [美]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 128 号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优势[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 [4] 李钟文,米勒,罗文.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5] NEEDHAM, J.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 [6] 刘钝.科学史、科技战略和创新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1).
- [7] 阮爱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创新精神的影响[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1(2).
- [8] 高炜,吴艳.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J].前沿, 2002(9).
- [9] 范毓周.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J].郑州大学学报, 2006(3).
- [10] 王保国.文化纽带与国家统一——以中原文化为中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5).
- [11] HALL, E.T., Silent Language [M]. Greenwich Conn, 1959.
- [12] [法]维克多·埃耳,文化概念[M].晓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13] 吴次芳,谭永忠.制度缺陷与耕地保护[J].中国农村经济, 2002(7).
- [14] 胡军.跨文化管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49.
- [15] 参见上海市行业年鉴编辑部的《世界 500 强内部参考资料》, 2004.
- [16] 郑晔,杨世文.儒家文化与近代科学[J].四川大学学报, 2003(4).
- [17]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18] KAHN, H.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的演化分析

王焕祥, 孙 斐

(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在介绍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区域创新体系演化的历程,并从区域创新体系演化动力的角度对其演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了我国区域创新体系演化过程中的经验,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区域创新体系提出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区域创新体系;演化;演化动力;改革开放30年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8)09-0036-04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区域创新体系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其它地区也都将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作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区域创新体系演化过程的研究,揭示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演化的内外部动力,以期对我国构建与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有所启发。

1 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

库克(Cooke, 1992)最早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RIS)的概念,他认为区域创新体系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 and 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系统,而这种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1]。萨思讷尼安(Annalee Saxenian, 1994)通过对硅谷和麻省128号公路地区电子产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硅谷之所以成为世界电子和计算机的研究和制造中心,并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主要是依靠其看似永不衰竭的创新动力来实现的。这种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依赖的是本区域创新体系的作用。麻省128号公路也正是因为本区域未能形成这样一个创新体系而衰落^[2]。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创新体系框架内,开始了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

[M].London:Groom Heim,1979.

[19] 胡军,朱卫平.广东省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总报告[R].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2003.

[20] KLINE,S.J. & ROSENBERG,N., An Overview of Innovation:The Positive Sum Strategy [M].Washington ,D.C.:Na-

tional Academy Press,1986:285-288.

[21] IANSITI,M.,Technology Integration : Making Critical Choice in A Dynamic World [M].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10-23:161-170

(责任编辑:万贤贤)

From Imitative to Independent: the Cultural Origin and Evolving Direction of Larg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Behaviors in Chinese Central Area

Abstract: Cultural factors affect the behavior mode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deepl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Central Area ,whose main characters conclude valuing much on moral than technology,the doctrine of the mean,esteeming authority, ethnicism,advancing gradually by following the sequence and permissio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ultural origin of large enterprises' imitative innovation. It analyzes the dynamic state of innovation culture and innovation behaviors during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in the view of evolu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 Behavior; Cultural Origin; Evolving Direction

收稿日期:2008-07-15

作者简介:王焕祥(1972~),男,河北沧州人,博士,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制度与演化分析的一般方法、区域创新战略;孙斐(1983~),男,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与创新。